

袁济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

袁济喜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袁济喜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2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101-03430-6

I.古… II.袁… III.古典文学-文学理论-文学
研究-中国 IV.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8998 号

责任编辑:宋凤娣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古代文论的人文追寻

袁济喜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 1/2 印张·214 千字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17.00 元

ISBN 7-101-03430-6/K·1478

中国人民大学古典文学研究丛书

总 序

这套丛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近年来取得的部分新成果。

我们教研室包含三个研究方向:古代文论一个方向;古代文学两个方向,一是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一是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古代文论单独一个方向,是研究对象有别;而古代文学内部的两个方向,则是研究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前者着重于材料的搜索与考辨,个案的审察与解析;后者着重于义蕴的探求与阐发,脉络的清理与贯通。用古人的话说,前者旨在“照隅隙”,后者旨在“观衢路”。这两种方法和旨趣的不同在古代文论研究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因为人员较少不便分开罢了。

然则,上述两种方法犹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当求两全其美,何可分而治之耶?此言极是。无论研究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立足之根基都是文献考索与个案解析。“隅隙”皆暗,“衢路”何观?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是也。而无论古代文学还是古代文论,其精深之义蕴又都在产生它们的传统文化之中。俯首“隅隙”,何观“衢路”?所谓“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是也。然则,理虽如此,事或多端。即使皆以两全其美为标的,实际做下来也会各有偏长,各有侧重。此乃“情性所铄,陶染所凝”,自然而然者也。因其

自然之势而分之,可使各骋所长,各成其美。与其“汉”“宋”相抵,何如“汉”“宋”并峙?

姚鼐论文之阴阳刚柔,有曰:“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上述两种研究方法之关系,似亦近于此。考据与义理糅而兼胜,固历来大家之风范,我辈景仰之余,当竭力勉之。“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自当着意免之。至如“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既无醒目之新材料,亦无迈往之新见解,文献考索与文化分析两不相涉,唯以时髦之“话语”餍人者,尤当尽力绝之也。

现在出版的这套丛书,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研究方向和学术旨趣。其瑜瑕得失,恭请学界同人与广大读者评判。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人大中文系与中华书局都给予了热诚的帮助。感激之余,我们将更加努力地工作,争取以更好的成果答谢他们的厚意。

引 言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
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诵读《诗经·秦风·蒹葭》中的这些诗句，常常使人感受到那种于怅惘中求索不止的执著。这首具有古典象征意义的诗，展示了人类在寻绎理想人格中的迷离惆怅。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内在灵魂正是源于古老的人文情结。从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来说，是一种以儒道释糅和而成的世俗文化，其关注的中心便是对于人生理想与人格的超逸，它从天地人融合的角度去探讨理想人生与理想人格，其人文思想的核心，即终极关怀不同于西方的人文精神依托于宗教，它是以现实人格的构造与追求为特点，而理想人格的境界往往存在于审美境界之中。中国的诗性文化构成了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家园。这种人文关怀，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的文艺作品之中，也存在于理论形态之中，作为哲学与诗的交融，中国古代文论的完整形态肇始于先秦孔孟、老庄的学说之中，中经《周易》的整合，之后又受佛教的影响。在言说文艺作品层面的同时，充溢着深挚的人文蕴涵，其概念范畴既依托文艺作品，同时更有内在的哲学意蕴与人格精神的激活。从孔孟、老庄到《周易》，在议论宇宙人生的同时，也对文艺和审美作出了自己的解

说。特别是《周易》中立象尽意,言不尽意的思想方法,以及通过卦象与言辞来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将事物分成形而上之道与形而下之器的恢宏气概,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思维空间,嗣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张大,对于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的内在精神产生了极大的启示。如刘勰《文心雕龙》的“体大思精”,追求文学与人生、天道统一的文学观念,将中国古代文论的人文精神扩大到崭新的天地。

人文意识或者说是人文思想,从大的方面来说,是人类对于自身命运存在的探讨,对理想人生的关注。这些形而上之道又浸入了特定时代的人生忧患,渗透着宗教与诗歌的因素,它具有不可言说只能意会的成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朦胧的情绪与思理,适宜在诗性文化中生存与发酵,中国古代的文学与文论在形态上是一种近似值与模糊数学般的意义寻绎。要想用科学意义的概念来说清楚,确实是难以为之的。不过也许正因为不可言说,就像那首古老的《蒹葭》中的寻寻觅觅,朦朦胧胧,才使人们不断地去求索,去创造“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的精神产品,使每一时代的哲学、文学、美学与宗教充满了人文的魅力,以激活其内在生命。这是中国古代文论发展的一条明显脉络,也是“五四”以来蔡元培、王国维、鲁迅、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学者致力于探讨,并且已经取得卓越成就的工作。在近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作者一直想在严格考索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努力去追寻古代文论中的人文意识,试图从中找到与我们今天文论建设有契合点的精神价值。收在这本书的文章,有的是首次刊发,有的是从已经出版的论著中选录修改后定稿的。这些研究诚如书名所言,只是一种追寻,一种执著,也许那个本体只存在于求索的过程之中。至于书中的错误与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

目 录

引 言	1
文化关注与古代文论研究	1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人文蕴涵	8
中国传统美学的生成与传承	29
论中国传统美学的人格底蕴	54
中国传统美育与人文视野	72
文艺之美与天地之心	88
神会与妙悟	102
先秦美学中的审美感觉论	122
如何看待老庄与美育	134
“兴”与原始生命	144
论“兴”的审美世界	175
逸兴与逍遥	207
永远的华亭鹤唳	245
忧生与挽歌	252
人文走向与审美流变	267

主要参考书目·····	293
-------------	-----

文化关注与古代文论研究

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时至今日,亟待从文化的角度去加以关注与激活。这并不是故作新论,而是笔者在多年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过程中深切感受到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精髓,在于有深厚的文化精神作为底蕴,是服从于中国文化的总体格局的,而我们目前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却恰恰在表层上做文章,未能深入其底蕴,这样就难以突破工具论的束缚,而上升到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内核,致使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未能成为“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精神承传活动。在我看来,中国古代文论的真正价值,不仅仅在于表层的观念学说之上,而是在于超越其上的深挚的人文精神之中,这种精神价值是最值得我们今天加以承传与重构的,也是使中国古代文论活起来的根本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是自中国远古时代就萌生的精神文化的产物,它受制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与文化意识。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相比,自古以来就生存在相对稳定的农耕与畜牧相结合的自然环境之中。从六七千年前开始,我们的先民就在黄河、长江流域的河边与原野中,开始了固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此相适应的便是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群体组织形式。这种与天相俾的农业生产与血缘社会形态,造成了先民们将自然与社会的统一与和谐视为最高的生存境界的文化观念。他们从与天合一的生存意识出发,形成了天人不分,物我相合的原始思维,并深深地铭记在《周易》的阴

阳八卦与同时出现的阴阳五行学说之中,这种混茫一体的观念也印刻在最古老的文学观念之中。《易传》中“物相杂谓之文”与“兼三材而两之”的文化观念,影响到文论领域,便是杂文学观念的一以贯之,其缺点是造成中国古代文论的界定范围不甚清楚,其优点却是促使中国古代文论与文化精神的一体化,从人本高度去观察文学理论问题。中国古代文论与美学善于从“原道”,即本体意义上探讨文学现象,将文学与天道自然、人生和谐视为统一之物,从而使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文论自古希腊开始善观细部的认知价值观念不同,具有浓郁的形而上之精神价值。“原道”的文学价值观念,也使得中国古代文论形成一个开放灵动的思想体系与变动相和的方法论,从而启发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吸纳不同的学说,熔铸成既有时代特征又有永恒人文蕴含的精神价值。因此,说中国古代文论仅仅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总结,这种观念是很不恰当的,最明显的例证便是先秦时代的文论大都是诸子从文化理论角度阐发的,是他们人生主张与文化主张在文学领域的投射。老庄对文学与审美表面上是很反对的,但实质上却有着很深刻的见解。时至今日,有谁能否认他们从天道观念出发建构的文学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的巨大影响呢?

从中国古代文论的形成与发展来看,中国古代的文论家首先是充满人文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他们往往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与人生的尖峰上来考察文学现象,回应文学与文化建设中出现的严峻问题,建构自己的文学思想与美学理论的。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一流的文论家首先是这种思想家而不仅仅是鉴赏家与批评家,他们总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面临转折与惶惑时,从深沉的人文忧患意识出发,对文学理论进行卓有成就的建设。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

价值,不仅仅表现在具体的思想观念、学说范畴的提出与演绎上,更主要的是表现出这种文化精神,它们是文论家构建文学理论的动力,也是他们全部学说的逻辑出发点。比如春秋以来,中国从夏商周三代形成的宗教神学与礼乐文化,随着宗法制度向封建制度的嬗变而发生变化,当时业已萌生的诗乐文化及其文学观念,也面临“礼崩乐坏”的危机,儒、道、法、墨诸家围绕对礼乐文化的评价,以及由此而来的天道人性问题,开展了激烈的争鸣,其中心是从人性论与人生论出发,对文学的真善美问题作了不同的回答。儒家的中和为美、文质彬彬与道家的逍遥无待、乘物游心的价值观念既是文化伦理的判断,同时也是文学审美的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庄子的哲学便是他的美学。人文忧患意识与美学的高度统一,在中国古代文化中,较之西方以认知为目标的文学观念,是大不相同的,也是中国古代文化重要的民族特色与精神传统。

古代文论的这种注重人生与艺术的统一,追求个体与社会的和谐的精神品味,成为后来中国古代文论向前发展的优秀传统,它在两汉时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写作中得到了弘扬。孔子提出的“诗可以怨”,司马迁宣传的发愤著书,以及魏晋南北朝的以悲为美,唐宋时代的“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不仅成为文学创作的动力,也是文论家从事理论建构时的精神契机。这种从文化出发的文学理论建设传统,在刘勰《文心雕龙》的写作中得到了最典型的表现。刘勰为了克服汉魏以来文学日趋浮靡与文论“各照隅隙,鲜观衢路”的片面性,充分吸纳了先秦儒家与魏晋以来玄学及佛学从本体论观照文学现象的观点与方法,从“原道”的高度来看待文学产生与发展,认为汉魏以来的文学所以出现颓靡,根本原因是背离了文学的形而上之道,追逐外在的形式之美,从而失去了活力。他在《原道篇》中提出:

《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辞之所以能鼓天下者，乃道之文也。

这段话简明扼要地昭示了文学精神价值的作用。当然，刘勰过分崇儒给他的文论带来的负面作用也是毋庸置疑的。嗣后，唐宋以来的陈子昂、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严羽、王夫之、近代的王国维等人的文论写作，一直贯穿着这种追求精神意义的传统。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形的理论学说与各种范畴命题之中，更主要地表现在作者创建文论时的高度责任心与坚韧不拔的意志之上。这些文论家“不托飞驰之势，不假良史之辞”（曹丕《典论·论文》语），苦心孤诣从事文论建设的人格精神，本身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今天尤其是需要我们传承的。

从理论的结构来说，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与具体的学说范畴胶着而不可分，它与西方文论的价值观念与范畴学说畛域分明，也与西方文化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之上的框架有所不同。由于充满着特定的人文蕴含与直观感受的意味，故而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观念、理论学说与范畴命题，有着浑然一体，互相包容，彼互渗透的特点，最明显的便是范畴、命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不易剥离，难以确定的特征，鲜明地展示了中国文化一体化的特征。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从隐形结构来说，是由内在的精神价值即“原道”观念作为核心，集中表现在意境论与神韵论上，并由此生发出创作论、作品论、文体论等文论层面。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不仅应注重其具体的理论学说、范畴命题，以及演变发展的通史，更应注重背后的精神价值的开掘与承传，这种承传是一种薪尽火传、以心传心的活动，也是促使中国古代文论走出静观研究的天地，激活当代中国文论的创造性活动。要使中国古代文论

走出以古释古的范围,与当代文学活动相融汇,变为当代文论发展与延伸的精神资源,这种创造性的精神阐释与承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然,这种承传是重新解释与评价的过程,并不是全盘接受的意思,它具有特定的内涵。

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承传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来说,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从理论上来说,一个民族的精神的承传是可以超越具体的历史条件而获得,这是它的共同性。中华民族与其它民族相比,文化传统的一以贯之是一个重要的特征。中国古代文化与文论的形而上之道,实际上是民族精神与人格境界在理念上的凝聚,它以道家的“有无相生”的空灵性与儒家的中庸辩证法,以及《易传》的阴阳相和、生生不息作为其内涵,故而它一方面具有保守性,另一方面则充满着应变自如、开放包容的气度与能力,在对待外来的文化与学说时能够海纳百川,吞吐自如。鲁迅曾盛赞过的汉唐气魄,在对待外来的域外文化时,便具有这种兼收并蓄,为我所用的创新魄力与精神空间。中国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也不乏这样的典型,例如《文心雕龙》之于魏晋玄学与佛学,南宋严沧浪之于禅学,明清之际王夫之诗学的援佛入理,运用自如。这些杰出的理论家,面对时代巨变时形成的文化衰歇以及新兴外来学说的涌入,没有放弃对前代文学理论内在精神价值的承传与发扬,而是弘扬与激活了传统文论中的人文精神与忧患意识,并充分吸收了外来思想与学说的精华,从而创建出了无愧于时代与传统的理论学说。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中国古代文论赖以产生的封建宗法社会形态为新的现代社会形态所替代,以文言文为载体的抒情诗文被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描写现代生活的再现型新文学所更替。“五四”之后,古代文论更是受到西方文论与美学的冲击,但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生命力并没有消失,相反,它

在一些著名文学家与思想家的文论中,得到了继承与发扬。近代美学与文论的兴起与演变同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相伴,它既受西方启蒙学说的影响,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与改造,涌现出梁启超、鲁迅、王国维以及宗白华、朱光潜等一大批美学大师。他们将文学理论与美学的建设同改造国民性、塑造健康人格的时代重任结合起来,致力于中西文化的融合,其立人精神与文学理论融为一体,给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令人景仰的风范。他们的成功实践也说明了中国古代文论生命力并没有衰歇,其精神价值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也可以经过激活而发挥其巨大作用。

建国之后,我们从前苏联引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与美学,从而使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呈现出新面貌。与此同时,从五十年代开始,我们也开始重视对古代文学理论遗产的研究与运用,在对古代文论资料进行整理的同时,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侧重对中国古代文论通史的叙述与梳理,但是所持的方法论基本是西方文论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方法论,注重用既定的理论框架去衡量古代的价值,而对古代文论的精神价值则不予肯定,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文化特点更是不屑一顾,研究者强调的是古代文论的一些命题与范畴对我们通行的文学理论的补充与说明,而这种说明与印证又没有顾及到中国古典文论的精神实质,从而造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与当代中国文论之间联系的中断。古代文论精神价值中的人文忧患意识、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寻求艺术与人生的和谐、探索文学与理想人格的贯通,这些好的传统并没有真正地融入文学理论之中,从而使我们的文学理论偏重于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对创作规律的热衷,这就无法使文论创作与理论家的生命意识相融汇,无法使新的文学理论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传统与创新之间

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近年来,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西方文论与美学的大量涌入,研究文论的方法与观点都很先进,但是中国当前的文论与美学研究尽管取得了许多成就,却依然难以摆脱困惑与失落,文学理论与批评失去了自己的主体性与应有品位,成为时尚与既定概念的附庸,从而丧失了应有的忧患意识与创造性。文学理论与批评家面对日益不振的文学创作现象,却没能像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巨子一样,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没能如同近代以来的文学大师一样,从关注民族与社会人生的高度出发,对中西文化与文学兼收并蓄,咀嚼吞吐,融会贯通,为我所用。这不能简单地用受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影响的原因来说明,而是确实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站在建设社会主义文艺学与美学的高度,对中国古代文论精神价值的承传迫在眉睫。当然,这种承传不等于复古,而是出于对当今中国文论建设的关注,去找回失落的精神遗产,使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成为联接过去与未来的创造性活动,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文化建设的重任。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人文蕴涵

文体论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方面,它主要探讨文学表现在体裁形式方面的特点。中国古代文学体裁的丰富多彩,造成了文体论的相对发达,它既有对文体方面的总论,又有对各种文体的专门研究,如诗论、赋论、词论、散文理论等。唐宋之后,随着以小说戏曲为代表样式的市民文艺的兴起,小说、戏曲等文体兴起,成为后世文体论所探讨的内容。中国古代文体论是在大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既有技巧形式的层面,更有深挚的人文蕴涵可以寻绎。

中国古代文体论的发达,说明了中国古代审美意识的自觉程度。由于中国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汉语为载体的文字艺术,汉字独特的单音独体性,以及表意与表音相结合的语言特点,造成了汉语文学与西语文学相比,在形式美上更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声律、对偶、词采方面都更适应文学抒情与唯美的需要,形式上的工巧妍丽也更明显一些。在这种文化氛围熏陶之下,中国文人的审美意识与深湛的文化修养,以及个人的身世沉浮、心境感受,更能找到它的用武之地。自古以来,中国人对汉语文学特征的倾心揣摩,精雕细刻,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在六朝晚期即已出现了声律、用典、对偶与词采高度成熟的五七言诗与骈体文,它既说明了六朝人审美意识与内心感受的细腻深沉,亦表现了他们对文体形式之美的把